

# 重層土著化下的歷史意識： 日治後期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 之初步比較分析

吳叡人\*

## 摘要

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以歐洲的「外地文學」（或殖民地文學）論為理論架構。所謂「外地文學」論，是一種具有二重性的複雜理論。一方面，它從擴張性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視外地文學為母國語文學的延長，也就是移民使用母國語描寫外地生活的文學。這是母國語中心主義的主張。另一方面，它又從寫實主義的文學立場，主張外地文學應書寫具有在地特色的文學，而這個美學主張則必然蘊含了差異，乃至分離的可能。從這個理論立場出發，島田所建構的文學史主體，於是呈現出母國與外地之間的辯證關係。一方面，他主張在臺灣的文學史只能是母國日本語文學史的延長，「臺灣」無法單獨成為文學史的主體。另一方面，他承認在日本語延長的大脈絡中，隱藏著外地臺灣主體形成的可能性。其次，基於母國語中心主義的語言判準，島田文學史的處理對象只限於能夠運用日語進行文學創作的內地及來臺的日本人作者。第三，在敘事結構上，島田遵循編年史的時間序列進行書寫，然而在這個時間序列之中，隱藏著兩個彼此相關的邏輯：一方面，島田從外地文學的寫實主義美學尺度，逐步審視衡量不同階段作者作品的藝術的成熟度，然而在另一方面，這個寫實主義美學的逐步成熟，又隱然對應著日本在臺移民的土著化過程。第四，島田文學史中「外地主體」的出現，主要是從他寫實主義文學立場的論理之中衍生出來的結果。換言之，外地主體的出現，乃是非政治性書寫所產生的非預期的政治性後果。

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論述，借用了十九世紀法國史家 Hippolyte Taine 的名著《英國文學史》的理論架構，是一種典型的民族文學史論述。首先，黃得時預設「臺灣」構成了一個與「英國」或「日本」平行的文學史書寫的主體。其次，他

---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09年9月7日；通過刊登：2009年10月5日。

創造性地延伸 Taine 方法論中的「種族」概念，將臺灣人的民族形成，詮釋為「土著化」與「種族融合」這兩個社會史過程的產物。透過這個詮釋策略，他一方面克服了臺灣政治史的不連續性，使臺灣作為文學史書寫主體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也建構了一個多元主義的「臺灣人」概念，保留了討論多種族／多語作品的理論空間。第三，在敘事結構上，黃得時遵循一種目的論式的「從移民到落地生根」的土著化時間序列，分期討論從明鄭到清末漢族移民或中國內地作家關於臺灣的文學創作，如何從流亡者、官僚、旅行者書寫，最終轉化為在地書寫的過程。第四、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借用了 1940 年代初期大政翼贊運動之「地方文化」論所打開的言論空間，來重申 1930 年代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論，因此是一種鮮明的政治書寫。

**關鍵詞：**黃得時、島田謹二、文學史、移民、土著化、歷史意識、殖民文學、  
外地文學、民族主義

- 一、文學史之中的歷史意識
- 二、島田謹二的《華麗島文學志》：鄉愁的辯證詩學
- 三、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序說〉：「我即他者」的民族形成史
- 四、誰的臺灣？誰的文學史？：重層土著化下的兩種歷史意識

---

“...tel est le sens du mot ‘Algérien’ dans la colonie: Européen transplanté.”

——Ferdinand Duchêne<sup>1</sup>

私は、今、一つの文学の歴史を書き、その中に民族の心理を探らうと企てている。

——テーヌ、《英國文學史》、〈緒論〉<sup>2</sup>

“Is there then no hope for the de-Anglicizing of our people? Can we not build a national tradition, a national literature which shall be none the less Irish in spirit from being English in language?”

——William Butler Yeats<sup>3</sup>

## 一、文學史之中的歷史意識

作為一種現代的歷史書寫形式，文學史和所有其他歷史書寫一樣，必須仰賴敘事（narrative）來組織原本散亂、斷裂、無秩序的事實，以建構一個事後可以

---

<sup>1</sup> 本段法文中譯如下：「此即『阿爾及利亞人』在殖民地的意義：移植到這裡的歐洲人。」轉引自 Jonathan K. Gosnell, *The Politics of Frenchness in Colonial Algeria, 1930-1954* (Rochester, NY USA and Suffolk, U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p. 189。

<sup>2</sup> 本段日文中譯如下：「我現在試圖書寫一部文學史，並在其中尋找民族的心理。」引自イポリト・テーヌ著、平岡昇譯，《英國文學史》（東京：創元社，1943），第一卷，頁 50。

<sup>3</sup> 愛爾蘭詩人葉慈之語，中譯如下：「那麼，我們民族的去英國化就沒有希望了嗎？難道我們不能建立一個民族的傳統，一個民族的文學，它雖然在語言上是英語，然而卻一點也不失其為愛爾蘭的特性嗎？」轉引自 Declan Kiberd, *Inventing Irel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N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5。

被理性辨識的軌跡或系譜。這意味著文學史敘事之中必然隱藏著書寫者的歷史意識——某種被賦予了秩序的，關於事物的起源與發展，關於「過去」如何連結到「現在」，「現在」又將會導引至怎樣的「未來」的認知方式。這篇論文想要探究的理論課題，就是隱藏在文學史敘事中的歷史意識。

1930年代後期到1940年代初期，兩個非常不同的文學史論述出現在殖民地臺灣的公共論壇之上。一個是日本內地籍比較文學學者島田謹二在1934-1935年間，以及1939-1941年間所陸續發表，原本預定收錄於《華麗島文學志》的一系列論文中所建構的臺灣外地文學史論；<sup>4</sup> 另一個則是臺灣本島籍評論家黃得時在1943年的論文〈臺灣文學史序說〉中所勾勒的臺灣文學史論。<sup>5</sup> 這兩個文學史論述都是以「臺灣」為書寫主題，然而在寫作意圖，援引的理論基礎，文學史的主體與範圍，以及敘事結構各方面卻都是南轅北轍；兩者都主張某種臺灣的主體性，然而他們論證臺灣主體性的根據與內容，也同樣南轅北轍。似是而非——在如此曖昧的類似與差異之中，隱藏著兩種結構相似，局部重疊，但卻完全不同的歷史意識與認同。本文的目的在對這兩個文學史論述進行比較分析，並且藉由這個比較分析過程，揭露隱藏在其中的，重疊而差異的歷史意識與認同。

本文的論證可以簡述如下。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以歐洲的「外地文學」（或殖民地文學）論為理論架構。所謂「外地文學」論，是一種具有二重性的複雜理論。一方面，它從擴張性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視外地文學為母國語文學的延長，也就是移民使用母國語描寫外地生活的文學。這是母國語中心主義的主張。另一方面，它又從寫實主義的文學立場，主張外地文學應書寫具有在地特色

<sup>4</sup> 根據島田謹二戰後自述，他在1935年末開始認真思考撰寫一冊關於明治大正時期渡臺日人文學作品研究的著作，並預計題名為《華麗島文學志》。從1935年開始，島田逐步執行這項寫作計畫，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已經完成全書主體與結論部分之寫作，原本想在日本領臺五十週年時正式出版，終因日本戰敗而作罷。終戰過後五十年，學者平川祐弘氏根據已經辭世（1993）的島田當年擬定之《華麗島文學志》目次計畫重作調整增刪，補錄島田在1988年所寫的回顧〈『華麗島文學志』に打ち込んだ頃：台北における草創期の比較文学研究〉作為著者自序，並且刪除原定收錄之〈外篇〉（歐洲人的臺灣寫作之研究）諸文之後，這部幻影般的著作終於正式出版。本文所討論的島田各篇論文文本，即根據平川祐弘重新編輯刪定之版本。參見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1995）。關於島田自述之《華麗島文學志》寫作計畫，參見收於同書之〈『華麗島文學志』に打ち込んだ頃：台北における草創期の比較文学研究〉，頁9-10；關於平川祐弘氏的編輯取舍方針，參見收於同書之平川祐弘，〈あとがき〉，頁485-487。

<sup>5</sup> 本文討論所依據的黃得時論文本，為收錄於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学芸評論集》（東京：綠蔭書房，2001）第五卷之〈臺灣文學史序說〉（頁86-95），以及〈臺灣文學史（二）（三）〉（頁167-198）。

的文學，而這個「在地特色」的美學主張則必然蘊含了差異、變形、對立乃至分離的可能。從這個理論立場出發，島田所建構的文學史主體，於是呈現出母國與外地之間的辯證關係。一方面，他主張在臺灣的文學史只能是母國日本語文學史的延長，「臺灣」無法單獨成為文學史的主體。另一方面，他承認，乃至主張在日本語延長的大脈絡中，隱藏著外地臺灣主體形成的可能性。當然，這仍舊是單一語言（日語）及其混血、變形的主體性。此外，這也是一個缺乏歷史縱深，以未來為取向的主體性。

其次，基於母國語中心主義的語言判準，島田文學史的處理對象只限於能夠運用日語進行文學創作的內地及來臺的日本人作者。臺灣人作家日語的洗鍊程度尚未登堂入室，因此暫時不在討論之列。第三，在敘事結構上，島田遵循編年史的時間序列進行書寫，然而在這個時間序列之中，隱藏著兩個彼此相關的邏輯：一方面，島田從外地文學的寫實主義美學尺度，逐步審視衡量不同階段作者作品的藝術的成熟度，然而在另一方面，這個寫實主義美學的逐步成熟，似乎又隱然對應著日本在臺移民的土著化過程。第四，島田文學史中「外地主體」的出現，主要是從他寫實主義文學立場的論理之中衍生出來的結果。換言之，外地主體的出現，乃是非政治性書寫所產生的非預期的政治性後果。

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論述，借用了十九世紀法國史家 Hippolyte Taine 的名著《英國文學史》的理論架構，是一種典型的民族文學史論述。首先，黃得時預設「臺灣」構成了一個與「英國」或「日本」平行的文學史書寫的主體。其次，他創造性地延伸 Taine 方法論中的「種族」概念，將臺灣人的民族形成，詮釋為「土著化」與「種族融合」這兩個社會史過程的產物。透過這個詮釋策略，他一方面克服了臺灣政治史的不連續性，使臺灣作為文學史書寫主體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也建構了一個多元主義的「臺灣人」概念，保留了討論多種族／多語作品的理論空間。第三，在敘事結構上，黃得時遵循一種目的論式的「從移民到落地生根」的土著化時間序列，分期討論從明鄭到清末漢族移民或中國內地作家關於臺灣的文學創作，如何從流亡者、官僚、旅行者書寫，最終轉化為在地書寫的過程。第四、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借用了 1940 年代初期大政翼贊運動之「地方文化」論所打開的言論空間，來重申 1930 年代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論，因此是一種鮮明的政治書寫。

## 二、島田謹二的《華麗島文學志》：鄉愁的辯證詩學

嚴格而論，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不能算是「臺灣文學史」，而是「在臺灣的文學史」，而且主要是「在臺灣的日本（語）文學史」。<sup>6</sup>對他而言，作為殖民地的「臺灣」，無法獨立成為文學史的探究對象，因為數百年來來自不同母國的殖民統治，造成了這個島嶼在歷史、文化與語言經驗的斷裂與不統一，而這種斷裂與不統一，阻礙了一個獨自的文學傳統的積累與形成。因此，就文學史而言，臺灣只能作為各個階段不同殖民母國文學史的延伸來觀察。換言之，我們只能對在臺灣出現的文學現象進行以母國為中心的斷代的理解與閱讀，無法建構一個「臺灣文學」的獨自的歷史敘事。島田稱此種以母國為中心的文學為「外地文學」，而探究、比較不同階段「外地文學」發展的歷史，是殖民地臺灣唯一可能的文學史形式。<sup>7</sup>作為在臺日本住民，島田謹二將自己的臺灣外地文學史研究任務，界定在日本領有臺灣之後，日本文學向臺灣的擴張、延伸與發展。<sup>8</sup>

<sup>6</sup> 對島田謹二其人與作品做過詳盡深入研究的橋本恭子指出，島田謹二本來就明確地區分「殖民者的文學」（「外地文學」）與「被殖民者的文學」（「臺灣文學」），而他所計畫書寫的《華麗島文學志》純粹是關於前者的文學史。或許受到法國殖民同化主義之影響，島田所認定的殖民者文學，不限於血統純正的殖民宗主國人所創作的文學，也包括在精神文化上被同化的殖民地本地人，以及本地人與宗主國國人之間的混血後代的作品。參見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第三章第三節，頁75-81。本文在橋本上述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的核心要素，應在語言（日文）而非族群（日本人）。關於這點，請參照本節以下討論。

<sup>7</sup> 島田清晰地表述了這個前提：「如同前一節所簡述，直到目前為止在臺灣產生，乃至關於臺灣而被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當然應該構成日本文學史、支那文學史〔原文為「シナ，中國」〕、荷、西（乃至法、英）諸國的文學史的一章。將這些作品當成上述諸國各自的文學史之延長而進行探討，不用說當然是正當而必要的學術研究工作。那麼，將這些作品放在一起，由如此紛雜眾多的國語和國民在「臺灣」這塊土地上（乃至關於這塊土地）所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系統，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學術研究對象嗎？當然，對此種文學現象依循時間序列進行單純的記述不是不可能。儘管如此，此種單純的記述既非在探究一個擁有內在關聯性、脈絡，以及統一性的文學之成長、發展、衰頹，且因為它所處理的主體本身正如前述，是在一塊隨著時代差異而有國語、國民之不同的土地上，缺乏相互之脈絡與關聯的文學現象，所以對這種非統一體僅就其時間之推移而做成的紀錄，或許會成為一冊非常珍貴的手冊，但卻絕對不能視為一個獨立的學術研究工作。如果硬是想要將它當成學術研究主體的話，那就應該確立一個『殖民地文學』的科目，對叫做『臺灣』的殖民地之中的文學現象進行歷史性的掌握，探究各個時期的特性，並且將它與其他的殖民地文學的特性進行比較考察吧。如果是這樣的研究，那麼即使依照今日學術界的一般看法，也會做為一個學問對象而成立的。」島田謹二，〈臺灣の文學的過去について〉，《華麗島文學志》，頁20-21。

<sup>8</sup> 橋本恭子指出，島田的「外地文學」論映照出另一個「土著的被統治者臺灣人」為書寫主體的獨自的「臺灣文學」之存在。參見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頁80。橋本的觀察為

## (一) 理論架構：外地文學論

島田這個觀點的主要理論基礎，就是源於歐洲（特別是法國）的所謂「外地文學」(*Littérature d'outre-mer*) 或「殖民地文學」(*Littérature coloniale*) 論。<sup>9</sup> 如果就島田自己所做的理論重述觀之，「外地文學」論顯然是一種帶有兩義性的複雜觀點。一方面，它從典型的擴張性民族主義／殖民帝國主義的政治立場，視外地文學為母國的民族文學（「國文學」）的延長，也就是移民使用母國語描寫外地生活的文學。這是母國語中心主義的主張。另一方面，它又從寫實主義的文學立場，主張外地文學不應模仿母國文壇，而應書寫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學。這是外地自主的主張。<sup>10</sup>

---

我們提示了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臺灣文學」這個概念預設了一個有別於宗主國（日本或中國）人的「臺灣人」認同之存在，然而臺灣人認同的出現又暗示著在日本人之前，一波外來移民的土著化過程已經在臺灣發生，乃至成熟。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土著化的出現，意味著歷史意識的發生，政權的不連續性所造成的時間感之斷裂開始被克服。換言之，土著化的發生，意味著書寫土著化了的「臺灣人」的「臺灣文學」的歷史敘事是可能的。也就是說，承認臺灣文學存在，必然意味著承認臺灣文學史的可能。島田謹二雖然認知到「臺灣文學」之存在，但卻將之存而不論，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論證上的這個矛盾。

<sup>9</sup> 本文作者查閱 2007 年出版之法文 *Dictionna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法國殖民辭典）之後，發現並無 *Littérature d'outre-mer*（即島田所謂「外地文學」，直譯應為「海外文學」，因為法國稱其殖民地為「海外省—海外領土」[*Département d'outre-mer-Territoire d'outre-mer*]) 條目，只有 *Littérature coloniale*（殖民地文學）。參見 Claude Liauzu, *Dictionna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 (Paris: Larousse, 2007), pp. 417-419。由此觀之，「外地文學」或「海外文學」一詞似乎並未進入當代法文關於殖民主義言說之語彙之中。換言之，在島田謹二尋求理論依據之法國文學研究界，關於殖民者在殖民地所創作的文學類型之正式稱呼應該是「殖民地文學」。為何島田選擇主要以「外地文學」來表述 *Littérature coloniale* 一詞？根據橋本恭子研究，由於在島田的文學分類架構中，「殖民地文學」意指「被殖民者文學」，為了與此區隔才選擇「外地文學」一詞。參見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頁 90。

<sup>10</sup> 這是本文作者的整理，然而以下三段引文透露了島田對這種雙重觀點的自覺與（理論上的）無助狀態。首先，他認為外地文學是母國文學的延伸：「那麼，像這樣當一國領有外地之時，對於在前往該地，乃至在該地成長者之間，以該地的自然與生活為素材，使用該國國語創造的文學進行的研究，在現代的文藝學之中是用什麼名稱來稱呼，用什麼方法來處理，又提出了什麼樣的成果呢？」其次，他又主張外地文學必須具有專屬外地的美學特性：「我認為這種特殊的新遊記文學很可以成為外地文學的一個新的核心，不過構成外地文學核心的精髓部位的，還是居住在外地者的創作。捕捉外地特異的風物，描寫外地生活者特有的心理，而且如果能夠達到了傑出的藝術價值的程度，這才算是真正意義的『外地文學』吧。」然而對於這兩種具有明顯內在緊張關係的觀點，島田並未進行有說服力的理論性整合，而僅試圖以常識性的含混語言——所謂特殊的「地方文學」——予以綜合：「探究這些文學史上特殊現象的學問在某個意義上，是國文學史研究的一個延長。這並非對於在當地土生之文化程度不高的異民族文化的研究（那應該歸在考古學，土俗學，民俗學，語言學，史學等領域之內）。在移居當地的該國人的文學的意義上，視為國文學史研究的一個延長是理所當然的。然而與此同時，由於這又是在風土和人種上與本國相異的地域之特異的文學，如果著眼於此點，那麼使用普通的國文學史研究法應該也會有難以充份發揮效果之處。就此而言，這是一種地方文學史，而且是屬於一個叫做本國之特別的外地的地方的文學史研究。」島田謹二，〈臺灣的文學的過去について〉，《華麗島文學志》，頁 23，26-27。

外地文學作為國文學的延長，或者母國語中心主義的觀點，在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脈絡中，可以追溯到明治中期的國粹主義和日本主義。<sup>11</sup> 明治 27 年（1894），也就是日本領有臺灣的前一年，志賀重昂在他的名著《日本風景論》中所寫的這段話，可以說是這種文化或文學的帝國主義最古典的表述：

若吾皇之版圖向臺灣島擴張，則熱帶圈內的景象就會新加入到日本的風景之中，而若山東半島亦納入吾皇版圖，則山東半島既為支那人【原文如此】古往今來仰望為「岱宗」之泰山所在，故當可描繪出新山河之雲煙水光，擴大《日本風景論》之材料，使之改印再版，如此更能博取風懷高士、雕刻家、畫師、詞客、文人之一大衆吧。祈願有朝一日，將使吾人之富士山成為「岱宗」，而與「千島富士」（千島國後島之爺爺岳【チャチャノボリ】），「蝦夷富士」（胆振後方羊蹄山），「津輕富士」…「南部富士」，「吾妻富士」，「榛名富士」，「鎌倉富士」，「伊豆富士」，「八丈富士」，「近江富士」，「都富士」，「有馬富士」，「播磨富士」，「伯耆富士」，「安藝富士」，「讚岐富士」，「子富士」，「筑紫富士」，「豐後富士」，「薩摩富士」相同，臺灣最高峰玉山也因型態宛如我富士山而轉稱為「臺灣富士」，山東省的泰山也改稱為「山東富士」，在吾皇版圖之中一齊戴上富士山之名！<sup>12</sup>

這是「帝國的凝視」（imperial gaze）——透過新語言的覆蓋與再命名，殖民地陌生的風景被收編到母國的「民族的身體」（geobody）之中。<sup>13</sup> 在這個層次上，

<sup>11</sup> 國粹主義是 1880 末期到 1890 年代在日本興起的政治思潮，也是對於明治前期政府歐化路線的反彈。所謂「國粹」，即英文之 nationality（民族屬性，國族屬性），而「國粹主義」其實就是 nationalism（民族主義，國族主義）之意。國粹主義主張貿易保護主義，要求立即廢除不平等條約，並且強烈批判資本主義體制對弱勢階級的剝削，要求在西方模式之外，另外尋找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基於這個反西方的立場，國粹主義也對當時亞洲新興之民族解放運動（如印度與中國）寄予關心。不過，這種初期的亞細亞主義卻成為日後日本擴張的思想母體之一。最著名的國粹主義者為創刊《日本人》雜誌的評論家志賀重昂，著有《真善美日本人》的哲學家三宅雪嶺，以及以「國民論派」知名的政論家陸羯南。參見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內》（東京：岩波書店，2000〔1999〕），頁 85-99。

<sup>12</sup> 本段引文轉引自大室幹雄，《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精讀》（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 276-277。本段中文為本文作者自譯。此外，後藤新平的《日本膨脹論》則是這種擴張主義最古典的政治表述。參見後藤新平，《日本膨脹論》，收於小路田泰直監修，《史料集 公と私の構造：日本における公共を考ふるために》（東京：ゆまに書房，2003），第四卷：後藤新平と帝國と自治，頁 475-605。

<sup>13</sup> 「geobody」一詞為泰國學者 Thongchai 所創造之概念，原本用來指涉現代西方式地圖在特定國民心



島田的「外地文學」論顯然具有相同的收編意圖。不過，島田論述的複雜性在於，他對殖民地風景的凝視，不僅止於國粹主義者那種機械和表層的語言覆蓋與命名而已；他更試圖穿透風景的表層，進入殖民地內面與精神之中，掌握殖民地的真實。異國情調與心理的寫實主義的融合——這是島田外地文學論最核心的精神，<sup>14</sup>一種非政治的、美學的渴望，但是在這種美學的渴望之中蘊含著一種政治的敏感性，使他認知，乃至肯定民族語言擴張過程中「差異」、「混血」、「變形」現象的不可避免，以及由此伴隨而生的對立與分離之可能。

## （二）文學史主體：做為內地日本「文學的延長」之外地臺灣

島田《華麗島文學志》中，臺灣的文學史主體不是臺灣，而是「作為日本內地延長之外地臺灣」。如同上一節所述，這個外地文學論的陳述之中，包含一個母國與殖民地的辯證關係：做為母國的「文學的延長」，在臺灣的文學史書寫的主體，當然是母國語——日本語的文學，然而在這個母國語文學延長的脈絡之中，卻隱藏著差異、變形，以及外地臺灣主體浮現的可能性。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種臺灣主體性，依然是單一語言——日語——脈絡中產生的主體性；它的基礎，不是漢文、臺語，或者任何原住民語，而是母國語日語的變形與混血。換言之，島田「外地文學論」架構中浮現的臺灣主體性，是植根於某種「日裔海外移民」(creole Japanese)的主體性。此外，我們也必須注意，這種日語擴張脈絡中浮現的臺灣主體性，是一種缺乏歷史縱深，以未來為取向的主體性，因為它只能夠有限度地回溯到 1895 年日本統治起始之日。

---

中所型塑出來對該國國土形狀之想像。本文作者在此借用這個概念來描述志賀重昂透過文字所描繪、召喚出來的對日本國土之想像。參見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a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sup>14</sup> 「還有，向來的異國情調文學都是以土著的表面的風俗描寫為主，許多地方都看得出有旁觀者耽溺於觀看外表的興趣之傾向，真正掌握了當地居民之心理特性的作品極為稀少。就詩的形式而言，俳句在這點特別令人搖頭嘆息。印度支那的法國人文學也被認為大多只能成功地用西歐人之眼捕捉了當地風物的外觀，能夠表現當地住民的思考與感受方式的作品很少。然而，住在臺灣的我們絕不可止於此。願使此種文學更加更加透徹地捕捉真實吧。只有異國情調與寫實主義渾然融為一體，才會開始成為萬人肯定之大文學。只有到了那時，此地生活之文藝的詮釋才會開始成立。」島田謹二，〈臺灣の文學の過現未〉，《華麗島文學志》，頁 476。

### (三) 討論對象：日本（語）族群的作家

作為內地日本之文學的延長，外地臺灣的文學史所討論的對象，自然以內地的日本人與移往外地的日本移民的作品為主。當然，這首先是基於民族身份的考量，因為「文學的延長」本質上就是日本民族向外擴張的一環。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基本上是一個以「語言」為主要依據所界定的民族身份，因為戰前日本民族主義的主流，是上田萬年所發展出來的語言民族主義。<sup>15</sup> 戰前日本帝國在沖繩、臺灣、朝鮮等地進行的同化政策，就是語言民族主義向外地的擴張。以語言界定的民族身份，本質上有一定的開放性：至少在理論上，它容許新成員透過學習與獲得日語能力的過程，取得「日本人」的身份。<sup>16</sup> 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說，島田選擇以日本人作家作為文學史的討論對象，排除臺灣本島籍作家，主要是因為本島籍作家使用日語進行文學創作的的能力尚未成熟之故。<sup>17</sup> 這意味著在理論上，島田的外地文學史架構確實為一群未來可能出現的，已經跨越洗鍊的文學日語要求門檻的臺灣本島籍的日語作家，預留了一個位置。<sup>18</sup>

<sup>15</sup> 關於上田萬年的語言民族主義，參見安田敏朗，《帝國日本の言語編制》（橫濱：世織書房，1997）；長志珠繪，《近代日本と國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sup>16</sup> Benedict Anderson 指出，「由於被視為既是歷史的宿命也是經由語言想像出來的共同體，民族因此同時將自身表現為既是開放的，也是封閉的。」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1991]), p. 146。

<sup>17</sup> 島田確實注意到了 1930 年代中期已經出現本島人所創作的優秀日文新詩與小說，然而對他而言這些作品尚不足以名列外地文學史冊，因為他們距離滲透到民眾生活之間，成為普遍的日本教養之一部份的「擁有健全之美的新文學」境界，仍然有很長的距離。事實上，對島田而言，連在臺灣的內地人作品也尚未達到這個標準：「確實，擁有健全之美的新文學作品之佳作，應該具有其人性的，以及教育的價值吧。然而，如果我們問說，近十年間所產生的定居於臺灣之內地人文學作品到底是否擁有達到了那種〔人性與教育的〕高度的價值的話，那麼我們似乎無法遽然給予肯定的答案吧。就成於本島人之手之作品而言，由於有種種因素之故，此種掛慮不是會更加深一層嗎？」由此可見，島田構想的「外地文學」主要還是以語言（包含文字美學）為主要判準的。參見島田謹二，〈臺灣の過現未〉，《華麗島文學志》，頁 466。

<sup>18</sup> 這也是 Anderson 所說經由語言想像出來的民族共同體的另一種封閉性——時間——之所在：「雖然每個語言都是可學得的，但要學得語言需要耗費一個人生命的相當部分時間。」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 148。既然人生也有涯而通往洗鍊日語之路途無涯，延伸到臺灣的日本語共同體在當下必然是封閉的；它的開放性只存在於未來，而其開放對象則是日後才會出現的，被充分同化的新世代臺灣人。

#### (四) 敘事結構：作為美學發展的移民土著化

就《華麗島文學志》本論的敘事結構而言，島田大體遵循編年史的時間序列，逐一處理自明治中期日本領臺以來在日本內地與臺灣出現的文學作品。然而在這個時間序列之中，隱藏著兩個雖然不同，但卻彼此相關的「發展」或「演化」邏輯：一方面，島田以外地文學的寫實主義美學尺度，逐步審視衡量不同階段作者作品在藝術上的成熟度，然而在另一方面，這個寫實主義美學的逐步成熟過程，似乎又隱然對應著日本在臺移民的土著化過程。<sup>19</sup>

在本論中，島田討論了漢詩、俳句、短歌、寫生文（散文、小說）、新詩等幾種文類。他們出現的順序是：漢詩、俳句（子規的寫實主義傳統）、短歌（鄉愁）、寫生文（自然主義和旅行者文學）、新詩。

從「外地文學」的寫實主義標準觀之，在這幾種文類之中，發展最成熟的形式應推俳句。從渡邊香墨在明治三〇年代引進正岡子規的寫實主義傳統開始，這個文學形式曾經走上模仿內地俳壇以及形式主義的歧路，然而終於在昭和六年左右，藉由俳句刊物《ゆうかり（由加利）》選者山本孕江所提出的「臺灣俳句」論，重新回到了寫實主義的正道，並且創造了最接近島田謹二心中外地文學之「心理的寫實主義」美學高度，能夠掌握到外地景觀之內面性的臺灣特有之俳句風格。島田引用前田普羅之語，稱此為「俳句臺灣的自治」。<sup>20</sup>「自治」是1920年代初期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軔以來臺灣政治論述中最敏感而關鍵性的字眼，島田挪用這個充滿民族主義暗示性的政治修辭來描述一種美學風格，清晰透露了他「外地文學」論當中「由母國延長到外地主體現身」的美學的目的論（aesthetic teleology）。

<sup>19</sup> 與此同時，島田卻又對更早一波發生的漢人移民土著化視而不見，或者存而不論。參見註8。

<sup>20</sup> 「『如果自覺到要完全捨棄曾經在內地經驗過的季節感，改而遵循臺灣之季節感的立場』，那麼在此『真正意義的臺灣俳句』就會誕生。職是之故，孕江氏等人的主張就可以被扼要地歸納為：『以十七音定型俳句來掌握臺灣本來的姿態』的作品即為『臺灣俳句』。」島田謹二，〈「うしほ」と「ゆうかり」〉，《華麗島文學志》，頁406；「要讓不知道臺灣的人了解著眼於臺灣自然的俳句本來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為了成名，想要讓內地俳壇認可，就試圖以硬是扭曲了自然的作品來引起內地選者的注意。這種令人厭惡的弊風確實存在，對臺灣俳壇造成非常之毒害。因此，稱為『不如歸』系統，標榜客觀寫生者自不待言，凡欲捨此弊風而志於正道者，在論理上無論如何都應該歸結到這點：臺灣俳句當然應該在臺灣評判。昭和十年十月來臺的前田普羅氏用『俳句臺灣的自治』一語表達了這個道理。」島田謹二，〈「うしほ」と「ゆうかり」〉，《華麗島文學志》，頁412。

依循類似標準，成熟度僅次於俳句的文學形式是新詩。如同臺灣俳句的發展，島田謹二也描繪出一個臺灣新詩的系譜：從伊良子清白的〈聖廟春歌〉到西川滿的《媽祖祭》。這個臺灣的日語新詩系譜雖然單薄，然而從外地文學的角度觀之，它卻是成就斐然的：在此，島田從象徵主義詩的角度，解讀這兩位詩人如何運用臺灣本土象徵（形象、色彩等）成功掌握臺灣內面真實（「精神的な実体」）的創作過程。<sup>21</sup>

在寫生文（包含散文與小說）方面，雖然出現了佐藤春夫的〈女誠扇綺譚〉（大正 14 年〔1925〕），然而在島田眼中，這部珠玉之作規模過小，而且成於旅行者之手，因此不能算是真正的外地文學。<sup>22</sup> 最後，漢詩和短歌則是成就最低的兩種文類，只具有歷史紀錄的意義。

俳句和新詩之所以被島田謹二評定為最成功的外地文學形式，乃是因為他們拒絕模仿內地文壇，發展出能夠捕捉臺灣真實的風格——也就是說，他們之所以成功，乃是因為他們達成了某種「美學的本土化」。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這兩種成功「本土化」的日本文學形式，都是總結或大成於長住臺灣的作者之手。俳句的臺灣化，始於大正 7、8 年（1918-1919）花蓮港大樹吟社的刊物《うしほ（潮）》，而大成於臺北的《ゆうかり（由加利）》，而這兩個團體都是由久住臺灣（乃至埋骨臺灣）的日人移民或官員所組成。<sup>23</sup> 西川滿雖出身福島縣，但是兩歲就隨父親來臺，此後除赴日本內地就讀早稻田大學那幾年之外，一直到 1946 年為止，在臺灣居住時間超過三十年，因此雖非嚴格意義之「灣生」，但幾乎也可稱為「地元」（本地）作家了。日本文學或美學的臺灣化與日本移民在臺灣的定住化或土著化重合——這與其說是偶然，不如說是從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之中產生的邏輯的必然。由此觀之，島田編年史式的書寫方式，應該不只是任意或方便之舉而已。

<sup>21</sup> 島田謹二，〈伊良子清白の「聖廟春歌」〉，《華麗島文学志》，頁 302；島田謹二，〈西川滿氏の詩業〉，《華麗島文学志》，頁 452-454。

<sup>22</sup> 島田謹二，〈佐藤春夫氏の「女誠扇綺譚」〉，《華麗島文学志》，頁 382-385。

<sup>23</sup> 島田謹二，〈「うしほ」と「ゆうかり」〉，《華麗島文学志》，本論第十章。

## （五）美學的外地化：非政治書寫的政治後果？

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史論述始於母國文學的外地延長，卻終於外地文學主體的浮現。誠如本文分析一再強調的，這個「瓜熟蒂落」的邏輯是一種從美學而非政治出發的思考，也就是外地文學論的「心理的寫實主義」所提出的美學本土化要求。島田謹二曾經對「心理寫實主義」的非政治性格如此再三致意：

那麼，應該要如何解釋外地文學之中的寫實主義的意義呢？我認為，外地與內地之間差異最大的社會特性應該在於，在與內地相異的風土條件下，在內地所看不到的不同人種共同居住，共營特殊的生活這一點吧。正如同比較人種學或比較心理學會以其個別學門特有的技巧處理這些問題一般，外地文學也在此發現一個獨特的領域，並且能夠以寫實主義的態度描寫出這些現象。然而雖說是寫實主義，我們也決不能將它和所謂普羅〔無產〕階級的寫實主義混為一談。那完全是為了達到特定政治目標而做，志在宣傳、教唆、暴露的東西，脫離了文藝的本分。並不是那種偏頗的東西，而是真正意識到文藝獨特的任務，只要將和內地相異的風土條件下比鄰而居的民族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生活方式的異性活生生地，「即其生」(「生に即して」)地描寫出來的話，一幅生之縮影就會完成，而在所謂「政治的態度」之外，在文學獨自的領域之中深深扎根之寫實主義的一個新種類也就會誕生出來吧。<sup>24</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藉由區隔純文學的寫實主義和普羅文學的寫實主義，島田試圖證明外地文學的純真與非政治性。然而這個證明是無效的，因為外地文學論所隱含的政治性，並非存在於普羅文學所主張的「階級」，而是存在於「民族」之中：文學主體性不會誘發政治主體性的要求嗎？「俳句臺灣的自治」不會擴散到「政治臺灣的自治」，乃至「民族臺灣的自治」嗎？島田從頭至尾謹守文學份際，然而從讀者的角度，我們實在很難不注意到他的外地文學論字裡行間中所隱含的鮮明政治訊息。<sup>25</sup>

<sup>24</sup> 島田謹二，〈臺灣の文學の過現未〉，《華麗島文學志》，頁476。

<sup>25</sup> 根據《Dictionna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的敘述，法國殖民地文學在美學上堅守寫實主義，批判異國情調式的寫法，主張深入「在地的靈魂」(âme indigène)，反對膚淺的刻板印象，然而在意識型態上，它也從未挑戰殖民的原則。換言之，殖民地文學的寫實主義立場僅止於美學層次，在政治

比方說，島田引為外地文學典範之一的愛爾蘭文學，明明就是一種主張與母國英國分離的民族主義文學——而且事實上愛爾蘭早在 1920 年獨立！——而他所推崇的葉慈，雖然使用英語寫作，卻是最「基本教義」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sup>26</sup> 島田經常引證的另一個外地文學典範——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阿爾及利亞法語文學，其實具有相當強烈的分離色彩，而他所推崇的那兩位當地法語移民作家 Louis Bertrand 和 Robert Randau，更是主張書寫所謂「*Algérianité*」（阿爾及利亞特性）的大將。<sup>27</sup> 事實上，從比較史的角度觀察，歐裔海外移民對移居的殖民地產生認同，從而主張與母國分離的所謂「海外移民的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本來就是島田所謂「外地文學」或「殖民地文學」產生的重要政治母胎之一。<sup>28</sup> 除了愛爾蘭和阿爾及利亞之外，其他類似個案更是不可勝數：澳洲、紐西蘭以及拉丁美洲諸國均是。<sup>29</sup> 在這些地區，「外地文學」事實上早已演化成外地自身的「民族文學」了。而看似非政治，充滿牧歌式情調的 Provence，其實是法國內部尚未完全被同化的異文化地區，本身也有分離傾向。<sup>30</sup> 身為比較文學學者，專精英法語系文學，乃至歐洲語系文學的島田謹二，有可能不知道這些基本事實嗎？當他將臺灣的西川滿比擬成愛爾蘭的葉慈的時候，<sup>31</sup> 他真的沒有讀過葉慈對英格蘭所表達的那種公開而決絕的憤怒嗎？

---

上則固守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界線。由此觀之，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確實相當符合其法國原型的精神。不過，法國殖民地文學之中另外有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對於「去文明化」（*décivilisé*），也就是對歐洲移民受到殖民地本地人生活之誘惑，反而被被殖民者同化的疑懼。很明顯的，這正是波蘭裔英國作家 Joseph Conrad 在他以比屬剛果為背景的殖民文學傑作《*Heart of Darkness*（黑暗之心）》（1902）之中所處理的古典主題。在這個對「去文明化」的種族主義式疑懼背後，其實隱藏著本文所論證之移民土著化與美學政治化的邏輯：寫實主義不會永久停留在美學層次，因為要進入在地的靈魂，靈魂必須土著化。遺憾的是，島田對於這個重要的主題似乎並無著墨，因此也就無由體認寫實主義產生質變之可能。參見 Claude Liauzu, *Dictionna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417-418。

<sup>26</sup> 關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愛爾蘭文學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參見 Declan Kiberd, *Inventing Irel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Nation*。

<sup>27</sup> 島田謹二，〈臺灣的文學的過去について〉，《華麗島文學志》，頁 26；Jonathan K. Gosnell, *The Politics of Frenchness in Colonial Algeria, 1930-1954*, chapter 6；另請參見 Claude Liauzu, *Dictionna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95, “algérianisme”條目。

<sup>28</sup> 關於海外移民的民族主義此一概念，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chapter 4, 7。

<sup>29</sup> 關於拉丁美洲各國與澳洲民族文學的形成，參見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chapter 5, 6。

<sup>30</sup> Alphonse Victor Roche, *Provençal Regionalism: A Study of the Movement of Revue Félibréenne, Le Feu, and other Reviews of Southern France*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54)。

<sup>31</sup> 島田謹二，〈臺灣的文學的過現未〉，《華麗島文學志》，頁 453。

“Now and in time to be, Wherever green is worn, Are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Easter, 1916)<sup>32</sup>

儘管他與臺灣本島籍人士沒有太多往來，然而畢竟久居臺灣（1929-1944），並且和本文下一節要討論的 1930 年代臺灣新文學運動健將黃得時有親交，<sup>33</sup> 那麼他會不知道「愛爾蘭文學」正是新文學運動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重要的隱喻之一嗎？<sup>34</sup>

島田所使用的歐洲「外地文學」概念，至少同時包含三種不同類型的文學：母國中心的擴張主義文學，已經產生分離意識的外地移民文學，以及內部邊陲地區的文學。或許島田不熟悉複雜的國際政治，或許他不長於清晰的概念性思考，然而我們不願意相信臺北帝國大學文學部教授島田謹二會對葉慈的民族主義一無所知。在獲得更多文本證據之前，我們無法解答這個謎題。<sup>35</sup> 如果島田確實想要迴避政治，那麼他的嘗試是失敗的——不只因為「外地文學」本質上具有無法抹煞的政治性格，也因為在殖民地臺灣的脈絡中，美學本土化的主張很難不誘發政治本土化的聯想。如果島田確實意在言外，別有懷抱，那麼我們顯然必須重新認識與解讀日本統治後期在臺日本人的政治意識。

<sup>32</sup> 本段為葉慈為 1916 年愛爾蘭民族運動復活節起義而寫之著名詩篇〈復活節，1916〉結尾，中文略譯如下：「從現在到未來／凡有穿戴綠衣之處／已經改變了，一切都改變了：恐怖的美已經誕生。」綠色為愛爾蘭民族運動之象徵色彩。參見 Richard J. Finneran ed.,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Revised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Scribner Paperback Poetry, 1996), p. 182。

<sup>33</sup> 根據島田謹二長女齋藤信子的回憶，黃得時在臺北帝國大學就學期間（1934-1937）就經常出入島田謹二住宅，在島田少數交往的本島人之中，黃得時是最親近的一位，兩人交情持續到戰後。參見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頁 51-52。

<sup>34</sup>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2（2006 年 6 月），頁 191-194、197-200。

<sup>35</sup> 比較文學學者齋藤一在引述正木恆夫的經典著作《殖民地幻想：イギリス文学と非ヨーロッパ》（1995）檢討日本後殖民文學研究的問題時，指出日本人如果想從後殖民角度來批評英國文學內在的殖民主義傾向，自己勢必也將面臨相同的批判，因為戰前日本的英國文學研究者「在侵略亞洲之前，已先戴上英國文學[的眼鏡]來重新凝視亞洲」。換言之，帝國日本的英國文學研究者在研究英國或英語文學時，自己同時也內化了英國（語）文學內在的殖民主義傾向。正木與齋藤二氏的洞見，或許能夠解釋包含島田謹二在內的戰前日本的英國文學研究者，為何會將英國（語）文學完全去政治化的原因：因為他們接受了主流（英格蘭的）英國文學中的殖民母國中心主義，所以自然會將葉慈這種產生自帝國邊陲的英語書寫視為母國文學的延伸，而非其異化乃至對立。參見齋藤一，《帝國日本の英文学》（京都：人文書院，2006），頁 8-10。

### 三、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序說〉： 「我即他者」的民族形成史

與島田謹二迂回曲折的「在臺灣的母國文學的歷史」適成對照，黃得時在〈臺灣文學史序說〉（1943）中想寫的，就是明快的「臺灣文學」的歷史，而他所勾勒的「臺灣文學史」架構，正是一種民族文學史論述的形式。這篇論文是黃得時對亦師亦友的島田謹二氏所建構之臺灣外地文學史論的直接反論，然而在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理解為 1930 年代前半臺灣新文學運動所展開的文化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建構工作的延續。當然，為了因應 1940 年代前半臺灣在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所經歷的變化——特別是日語成為共通語，以及第二代日本移民——即所謂「灣生」的——出現，黃得時的民族文學史論述呈現了比 1930 年代論述更鮮明的混血與多元主義傾向。<sup>36</sup>

#### （一）理論架構：H. Taine 的民族文學史論

黃得時的理論架構，就是十九世紀法國史家與哲學家 Hippolyte Taine（1828-1893）在他的名著《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1891）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Taine 在那篇著名的緒論中，提出塑造文學史的三個本源的動力：「種族、環境、時代」（*la race, la milieu, la moment*）。<sup>37</sup> 黃得時就是借用了這三個本源動力的概念，討論臺灣文學的形成與發展。不過，我們不應忘記，Taine 的架構，是一種「民族文學」（*history of national literature*）的研究方法。<sup>38</sup> 對他而言，文學是民族性的藝術表現，而文學史的研究，其實就是在研

<sup>36</sup> 青年研究者鳳氣至純平在他關於灣生作家中山侑的研究中，為我們勾勒了一幅「灣生」的簡單而生動的圖像。參見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特別是第二章。

<sup>37</sup> 本文所使用之版本為平岡昇昭和 18（1943）年版的日文譯本。參見イポリト・テーヌ著、平岡昇譯，《英國文學史》。關於 Taine 對三個本源動力的討論，參見イポリト・テーヌ著、平岡昇譯，《英國文學史》，卷一：〈緒論〉，頁 25-32。

<sup>38</sup> 日語通稱為「國文學」，此處捨「國文學」而用「民族文學」，除了考慮到中日文脈絡之差異外，主要在配合黃得時之理論意圖：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住民無法形成「國」。



究特定民族與其民族性或民族心理的形成。<sup>39</sup>「種族、環境、時代」三者，因此也就是塑造民族與民族性的三種力量。黃得時選擇這種理論來書寫臺灣文學史，其意圖實已呼之欲出：討論臺灣文學史，同時也是在探究「臺灣人」或「臺灣民族」與其民族心理的形成。這正是 1930 年代前半新文學運動殘留的課題。<sup>40</sup>

在 Taine 的三種本源的動力之中，最根本的是「種族」。這是一種內在的民族形成動力，歷經漫長的時間才會出現，是一種近乎生物性的遺傳特徵，無論外部的力量如何衝擊影響，種族特性仍會保留若干痕跡。第二是「環境」，也就是對原有種族特性進行「加工」的外部力量。第三才是「時代」：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時代，都會表現那個時代精神的特徵。<sup>41</sup>這種論式顯然受到十九世紀後半西方人種論的影響甚深，不過 Taine 的人種論雖然有本質主義色彩，但卻不是封閉的純血主義，因為它容許不同種族的混血融合。他在《英國文學史》當中所描繪的英國民族形成史，就是從薩克遜人到諾曼人入侵這段時間中發生的征服、同化與融合過程。換言之，依照 Taine 的架構，民族形成就是多種族融合的過程，而民族的性格，則表現了參與融合過程的這些種族的特性。這個「種族融合」的邏輯，就被黃得時應用到他的臺灣文學史架構之中，成為核心概念之一。<sup>42</sup>

## （二）文學史的主體與範圍：臺灣與土著化的臺灣住民

黃得時運用 Taine 的文學史架構書寫臺灣文學史產生了三個重要的理論意涵。首先，他的文學史論述是預設「臺灣」作為文學史主體的民族文學論。其次，「種族融合」與「土著化」這兩個過程構成臺灣文學史開展的主導動機 (*leitmotif*)，

<sup>39</sup> イボリト・テーヌ著、平岡昇譯，《英國文學史》，卷一：〈譯者序〉，頁 6-7、11-12。

<sup>40</sup> 作家巫永福早在 1934 年即已運用 Taine 的架構來詮釋臺灣文學的民族屬性。參見巫永福，〈我々の創作問題〉，《臺灣文藝》1: 1 (1934 年 11 月)，頁 54。筆者曾另外為文指出，巫永福在這篇文章借用 Taine 的「種族」概念，直接將臺灣人定義為「一個人種」的說法，是一種社會生物學的臺灣人論，也是 1930 年代前半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論述的本質主義化過程中所出現的最激進的臺灣人概念。參見吳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頁 197-200。

<sup>41</sup> イボリト・テーヌ著、平岡昇譯，《英國文學史》，卷一：〈緒論〉，頁 25-32。

<sup>42</sup>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在申論 Taine 的「種族」概念時，黃得時主張臺灣人是一個形成中的，多種族融合的群體，然而巫永福卻強調臺灣人是一個已經演化完成的單一種族。參見巫永福〈我々の創作問題〉，頁 54。引用同一個理論，卻有不同的應用與詮釋策略，這反映了兩個不同的時代背景以及兩種不同的書寫意圖：1943 年的黃得時是在民族主義全面敗退，先前建構的臺灣主體日益遭受同化主義之侵蝕瓦解的狀況中，逆向挪用主體被侵蝕的現實以進行隱諱曲折的民族抵抗；1934 年的巫永福，卻是在逐步昂揚的文化民族主義浪潮中步步進逼，或者測試民族主體建構的底線。

而這又延伸出第三個意涵：臺灣文學史具有多種族與多語的性格。這些思考，不是黃得時個人獨白的產物，而是他有意識地與他的師友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對話的結果。

黃得時關於臺灣文學史架構的討論，集中在〈臺灣文學史序說〉的第一、二兩節。讓我們先觀察他如何界定臺灣文學史的範圍：

不用說，臺灣是個外海的孤島，自古以來也沒形成統一的國家，除去鄭氏時代短短二十二年間之外，有時是荷蘭的屬地，有時是清朝的屬地，直到明治 29 年（1896）才收入日本的版圖。臺灣文學史自然受到這些政治性影響，其範圍極其廣大，而所要討論的對象也必須涉及到極多方面。簡單說是臺灣文學，可是和中國也有某些形式的特殊關連，把這些事情一併予以思考，臺灣文學史的範圍以及所要討論的對象，大體上有下面的五種情形：

（一）作者生於臺灣，他的文學活動（在此說的是作品的發表以及其影響力，以下雷同）也在臺灣進行。

（二）作者生於臺灣之外，但在臺灣定居，他的文學活動也在臺灣進行。

（三）作者生於臺灣之外，只有某個期間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然後再度離開臺灣。

（四）作者雖然生於臺灣，但他的文學活動在臺灣之外的地方進行。

（五）作者生於臺灣之外，而且從沒有到過臺灣，只是寫了有關臺灣的作品，在臺灣之外的地方進行文學活動。

上述五種情形中，真正可以成為臺灣文學史的對象的應該是第一種情形，但是如上所述，臺灣改隸以前屬於荷蘭或清國，改隸以後一直隸屬於日本，所以文學也與中國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明末清初時代的文學作品，幾乎都由對岸來臺的官吏和文人之手完成，因此，我們無法完全置之於文學史界線之外。所以，臺灣文學史應該予以處理的範圍，以生於臺灣、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情形，以及生於臺灣之外、在臺灣定居、在臺灣持續進行文學活動的情形為主；短暫逗留及其他情形，只限於有

必要時才採用的程度。領臺以後，只把內地人在臺灣的文學活動當作文學史的對象，這類見解稍微失之狹隘，我們不擬採用。因為我們相信，既然要撰寫臺灣文學史，只要那文學活動在臺灣進行，不管是原住民或本國人，至少都應相等的列入文學史的範圍內，這樣才是正確的。<sup>43</sup>

黃得時認為「臺灣出身者」與「臺灣永住者」這兩類應構成臺灣文學史的主要討論範圍。此處「臺灣出身」或「原住民」顯然指漢族臺灣人，而「臺灣永住」則指涉曾先後來臺的清國和日本移民。不過，這種說法裡面存在一個論證上的邏輯缺漏（*aporia*）：漢族臺灣人並不是真正的「原住民」或「臺灣出身者」；和後來的日本移民一樣，他們最初也只是「臺灣以外出身」，選擇「臺灣永住」的清國移民而已。他們之所以取得「臺灣出身」資格，乃是經由「永住」的過程。換言之，在像臺灣這樣的移民社會，「永住」是形成「出身」資格的必經過程。所以，黃得時文中所提第一、二兩項，其實是同一個移民土著化過程的「兩個階段」，而非兩種不同的範疇。所以，黃得時認定的臺灣文學史所應包含的範疇，其實就是「不分種族，選擇並定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事實上，黃得時在後面以編年史的方式逐一討論明鄭到清朝的作者時，遵循的不只是單純的時間序列，而是「移民—永住—出身」的土著化過程，因為他很明顯地在追溯「地元作家」的出現。也就是說，在最初界定臺灣文學史範圍時，黃得時已經預示了文學史書寫將遵循的敘事結構。

此外，「移民土著化」的範疇劃定標準，也暗示了他所想像的臺灣文學史所具有的開放、多元（多種族、多語言），以及非本質主義的性格。「從永住到原住」的法則指向了一個開放的範疇：它容許原住民族、漢族移民、日本人移民共同進入「臺灣」、「臺灣人」的身分之內。在這裏，黃得時顯然是在對島田謹二的母國中心主義與語言同化主義進行反論。

界定範圍之後，黃得時才開始觸及臺灣文學史是否可能的根本問題：

<sup>43</sup> 本段引文中譯出自葉石濤先生之手。葉石濤譯文全文參見黃得時著，葉石濤譯，涂翠花校譯，〈臺灣文學史序說〉，收於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雜誌篇：第四冊，頁 229-241，本段中譯引自該文頁 229-230；本段日文原文參見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文藝評論集》，第五卷，頁 86-87。

其次，有些人也許會說，改隸前的文學當然是清朝文學的一環，而改隸後的文學包含在明治文學之內，不必標新立異，單獨思考「臺灣文學史」。然而，臺灣從它的種族、環境或歷史而言，都各自具有獨特的性格，所以擁有清朝文學或明治文學怎麼也看不到的獨特作品。主張這種反對論調的人，猶如主張『日本文學包含在世界文學之內，而南洋史的一部份包含在東洋史內，另一部份則包含在西洋史之內，因此不需要特地為日本文學或南洋史巧立名目』之說。我們相信，一如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學之中大放異彩的意義，臺灣文學也具有清朝或明治文學所缺乏的獨特性格，因而撰寫了本文。<sup>44</sup>

毫無疑問，這段文字也是對島田謹二文學史論的批判。他的批判，主要是針對島田「臺灣無法獨立成為文學史主體，只能成為母國文學的延長或附庸」的觀點。黃得時認為臺灣自身就足以成為獨立的文學史主體。他提出的理由是，不論從 Taine 文學史架構的「種族·環境·歷史〔時代〕」這三個民族形成動力之中任何一者的角度觀之，臺灣文學都具有無法被任何母國文學吸收的特殊性。在這三者當中，最重要的顯然是「種族」的特殊性：

臺灣除原住民的高砂族之外，以前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居住過，鄭氏時代以後又有漢民族大量往來，改隸後更有日本人絡繹不絕地渡海來臺，臺灣種族真可說是多種多樣。漢民族中有福建人，也有廣東人；而福建人中更分為泉州人和漳州人，那性質也極其複雜。因此，這些種族所創造的文學，明顯地具有兩種特色。一個是針對本國的所謂鄉愁的文學，其餘是異民族間的融合、同化、征服、抗爭的文學。前者可以在明末清朝的詩文以及領臺後內地人的短歌和俳句中看得到；後者在所有的文學中都可以看得到，但特別是最近強調剛毅的建設精神和開拓精神的文學，就屬於此類。<sup>45</sup>

<sup>44</sup> 前引葉石濤中譯文頁 230-231；日文原文參見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頁 87-88。

<sup>45</sup> 前引葉石濤中譯文頁 231；日文原文參見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頁 88。

如果我們記得黃得時所提出的臺灣人或臺灣文學範圍的界定標準——「永住與出身」或者「移民的土著化」，我們就會理解上面這一段話中指陳的臺灣多種族現象表現在文學上的兩個特徵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臺灣在「種族」方面，除了原住民族之外，還有多種族的外來移民，這些外來移民雖然對於各自的母國懷有鄉愁，但卻也在臺灣逐漸土著化；這些逐漸土著化的各種族之間雖然不免有著矛盾衝突，但卻也終於逐漸相互融合。換言之，從黃得時這段陳述之中，我們可以將臺灣在「種族」方面表現的特殊性歸納為「土著化」與「種族融合」這兩個社會史的過程。我們或許可以將這兩個社會史過程，合併理解為一個「混血的土著化」、「多元的土著化」，或者「混血多元的民族形成」的過程。如果依循 Taine 文學史的架構來理解，黃得時對臺灣種族特性的描述之中確實隱藏著一個臺灣人的民族形成論。

更重要的是，從文學史書寫的角度觀之，「土著化」和「種族融合」這兩個相關的社會史過程的提出，克服了島田謹二所指陳的臺灣政治史的不連續性，使「臺灣」作為文學「史」的主體成為可能。因為，先後發生的「土著化」和持續進行中的「種族融合」過程，將被不連續的外來統治所切斷的臺灣歷史連結起來：外來統治雖然是不連續的，然而移民的土著化與種族融合過程卻是連續的，而這個社會史的連續性，則為文學史家提供了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標準，使之能夠依此挑選與衡量作家與作品，從而建構一個屬於臺灣的，獨自的文學傳統。

最後，這種「混血或多元的土著化」的社會史視野，以及「混血多元的民族形成」史觀，同時也隱含一個臺灣民族性的多元論。如同 Taine 所說的，不同種族可以融合，然而種族特性依然會殘存，因此我們會在多種族融合的民族之中觀察到具備多種族特性的民族心理。這個多元論的另一層含意是：它為構成臺灣人的各種族作家與作品都保留了空間——而且這意味著臺灣文學不只是多種族的文學，同時也是多語的文學。

必須說明的是，黃得時的文學史想像中隱含的多元／多語主義，基本上還停留在一種理論的可能性，尚未被真正實踐在一部完整的臺灣文學史書寫之中。在〈臺灣文學史序說〉的本論中，黃得時只處理了明鄭到清末的漢族裔作家，既未討論原住民族的文學，也沒有處理日本人作家與作品。對於原住民族口傳文學的

忽略，或許是受到儒教的文字中心主義影響。至於日人作家，他在兩年前所寫的〈輓近の臺灣文學運動史〉（1941）一文中，將 1930 年代以來活躍在臺灣新文學運動中的臺、日籍作家以及白話文、日文作品，做了一次鳥瞰式的評介。<sup>46</sup> 這說明黃氏確有書寫多語文學史的視野，可惜這篇文章過於簡略，也沒有清楚的理論架構，因此只能看成他寫作〈臺灣文學史序說〉的準備工作而已。更遺憾的是，日後在寫〈序說〉時，他沒有將這段珍貴的多語文學經驗納入寫作計畫之中，並運用 Taine 的理論架構對之進行改寫。結果是，我們終於無緣得見黃得時版的「臺灣文學史綱」比較完整的樣貌。

### （三）敘事結構：從遺民與官員到「地元」作家的誕生

黃得時在緒論中，依照編年史的時序，列了六個預計討論的時代：一、鄭氏時代；二、康熙、雍正時代；三、乾隆、嘉慶時代；四、道光、咸豐時代；五、同治、光緒年代；六、改隸以後。此外，他也將預計討論的文類，明確地限定在古典漢詩文作品之上。<sup>47</sup> 這個相當不完整的寫作計畫說明，除了前兩節的理論部分之外，〈臺灣文學史序說〉至多只能算是一篇臺灣文學形成的「前史」而已。不過，即使是這篇「前史」，他也只完成了鄭氏和康熙、雍正兩個時代就中斷而難以為繼了。為何如此？本文作者只能推斷，前段所敘述的多種族／多語文學史書寫計畫的執行，或許超越了當時年僅 34 歲的文學士黃得時的能力。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在這份極度不完整，而且不平衡的文本中，觀察到某種清晰的敘事邏輯與結構。簡言之，雖然只處理了漢族裔的漢詩文作者與作品，而且雖然不像島田謹二一樣擁有一致的美學標準（如寫實主義），黃得時的文學史敘事仍然遵循一個清楚的社會史的時間序列，也就是他自己在理論部分所提出的「移民土著化」過程。我們注意到，在討論不同時代的文人時，黃得時最在意的不是美學標準，而是本地作家的出現與成熟的過程——或者說，對黃得時而言，臺灣出身的作家的出現本身，就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美學衡量標準。因此，

<sup>46</sup> 黃得時，〈輓近の臺灣文學運動史〉，收於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 文芸評論集》，第四卷，頁 206-219。

<sup>47</sup> 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頁 89-95。

在討論鄭氏時代時，他特別在意沈光文這些遺民文人的鄉愁；<sup>48</sup> 在進入康熙、雍正期時，他會強調清朝渡臺官員作品中的「異國情調」，並且特別指出「尚無本地作家出現」；<sup>49</sup> 時序進入乾隆、嘉慶之後，他會立即指出「本地出身的文人逐漸出現了」作為本期特色，而接下來的道光、咸豐時代，則是「本地出身文人作品較渡來官員優秀」的時代；<sup>50</sup> 最後，到了同治、光緒的亂世，他則特筆宣示，本地優秀詩人如丘逢甲，則名聲已超越本灣本島而遠及於中國本土了。<sup>51</sup> 在這段敘事中，以政治遺民和渡來官員的「他者性」，對照「本土性」的誕生與逐步成熟的邏輯，非常清楚。與島田謹二的寫實主義美學邏輯相對，黃得時書寫文學史的主導邏輯，是「土著化」或「本土化」，而這其實是政治的邏輯。因此我們可以說，黃氏至少是局部地實踐了他在第一、二節理論部分所提示的臺灣文學史規律之一，也就是移民的土著化。

#### （四）文學史作為一種政治性的書寫

毫無疑問，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論述是一種政治性的書寫。無論從理論架構，書寫主體與範圍，以及敘事結構分析，我們都可以觀察到一種藉由線性敘事（linear narrative）來建構臺灣主體的意圖。這是非常典型的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的寫作方式。<sup>52</sup> 當然，他所使用的線性歷史敘事，所描述的是多種族移民的土著化與融合，這不是單一民族的封閉敘事，而是混血民族的開放敘事。更重要的，這種混血的臺灣民族史敘事，不是使用白話文或臺灣話文，而是使用日文書寫的。1930年代前半的臺灣新文學運動中，慣用日語世代的臺籍作者們運用日語書寫，建構了一個語言混血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意識型態。<sup>53</sup> 黃得時這篇日語的臺灣文學史論，顯然

<sup>48</sup> 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頁 89。

<sup>49</sup> 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頁 89-91。

<sup>50</sup> 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頁 91-92。

<sup>51</sup> 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頁 94。

<sup>52</sup> 關於民族史的敘事，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第十一章最後一節（“The Biography of Nations”），pp204-206。

<sup>53</sup> 巫永福用日文寫成的〈我々の創作問題〉也是這一波混血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物，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巫氏的臺灣人本質主義之核心要素並非語言，而是人種或種族。換言之，這一波文化民族主義雖然被迫在語言上讓步，但是在民族界線上不僅沒有棄守，反而以激進的「臺灣人種族論」正面挑戰了日本同化主義「同文同種」之官方立場。參見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頁 188-216。

是這個意識型態建構工程的延續與轉化——或者轉進。一方面，他賦予這個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一個歷史的縱深；另一方面，他提出多種族土著化的共同架構，為逐漸定住化的日本族裔移民日後進入「臺灣人」的身份，預留了一條道路。

當然，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政治氛圍不會容許臺灣民族主義的公然宣揚，因此黃得時借用了大政翼贊運動期間岸田國士主導的「地方文化」振興運動論述來包裝他的「民族文學」。<sup>54</sup> 就此而言，這篇出現在戰爭期的奇妙的民族主義論述，可說是一種在日益強大的同化壓力下，弱者試圖以迂迴方式保衛自身已然不純粹的主體性的「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up>55</sup>

#### 四、誰的臺灣？誰的文學史？： 重層土著化下的兩種歷史意識

在文章的結尾，讓我們嘗試歸納這篇文章所討論的兩個文學史論述。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始於母國文學向外地的擴張，卻終於母國文學的外地化，以及外地主體性的出現。換句話說，外地文學論始於帝國主義（亦即擴張性的民族主義），但卻終於（潛在的）分離主義。這種民族主義自我異化的過程，在某個意義上可以說是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所謂「帝國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發展，同時也是其否定」（「帝國主義は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發展であると同時に其の否定である。」）這句名言在文學理論上的表現。<sup>56</sup> 然而導致日本民族主義自我異化的觸媒，不是政治，而是美學：根據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的心理寫實主義邏輯，為了

<sup>54</sup> 黃得時，〈臺灣文壇建設論〉，收於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芸評論集》，第四卷，頁 27-34。

<sup>55</sup> Hidden transcript 是美國政治學家 James Scott 研究歷史中弱者抵抗形式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參見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90)。

<sup>56</sup> 這句話的本意為，主張民族應該具備文化同質性的民族主義一旦開始主張民族向外擴張，即轉化為帝國主義，然而民族向外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結果，又會將異質的文化要素吸收到內部，使內部不再具備同質性，因此也否定了民族主義。本文對這句名言做了反向，但是仍然保持原先意旨的詮釋：民族成員隨帝國主義擴張而流向外部領土，結果卻導致了這群民族成員的外部化。前者的邏輯是他者進入自我，而後者的邏輯則是自我變成他者，但是兩種詮釋的共同點在於：帝國主義的擴張將不可避免地顛覆民族主義對同質性的要求。參見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來社，1997〔1964〕），頁 278。



捕捉外地的內面真實，作者必須外地化。換句話說，為了書寫外地，你必須成為外地人。美學的要求，導致了土著化的要求。這句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如果西川滿想要成為真正的「臺灣的葉慈」，那麼他的象徵主義必須政治化——必須成為能夠捕捉隱藏在臺灣靈魂深處的悲哀與憤怒的，政治的象徵主義。

黃得時的民族文學論始於民族主義，終於民族主義。他的論理是明快的：因為我是外地人，所以我要書寫外地。然而這是一個弱勢的，夾縫中的民族主義，面臨強勢他者的擠壓與滲透，承受同化政策的扭曲與變形，他不得不放棄純粹與本質，在斷裂、不連續與雜質之中拼湊、重組自我的容顏。最終，他的民族文學史只能是一部「我即他者」(*Je est un autre*)的生命史，<sup>57</sup> 且將持續變化而不穩定。

最後，我們可以在前述這兩個文學史論述中，觀察到臺灣歷史上先後兩波外來移民在臺灣土著化過程中產生的兩種歷史意識。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論述之中，隱藏了一個 Benedict Anderson 所說的「海外移民的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這是 1930 年代前半出現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變形，它保留了漢族中心的臺灣民族意識，但是承認持續的種族融合與語言混血可能造成臺灣民族內涵的變化。這個論述所代表的，是較早移住臺灣的漢族移民在經驗土著化的完成，脫離舊母國，以及接受新母國統治的複雜過程後所產生的一種政治化了的歷史意識。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以社會為主體的在野的歷史意識，反映的是一種從未擁有政權的「沒有國家的民族」(*nation without state*) 關於自我形成的想像。

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既是日本民族主義論述的延伸，同時也隱含其變形乃至否定。它保留了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和後藤新平的《日本膨脹論》之流的擴張主義，但卻主張外地獨特性與日本移民的外地化。這個論述所代表的，是較晚近來臺的日本移民在臺灣經驗初期土著化過程所產生的歷史意識。這一波日本移民的土著化或臺灣化，因為時日尚淺，尚未發展成與母國對抗或分離的日本移民的臺灣民族主義。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這是一個跟隨國家力量擴張而形成的支配族群的歷史意識，因此它才會如此恣意地覆蓋或吸收在它之前出現的其他移民群體的歷史意識。所以即使我們可以設想有一天，這些在臺灣土著化了的日本移民終於產生了以日語為中心的政治分離主義，當他們終於從日本國家末端

<sup>57</sup> 「我即他者」，法國詩人 Arthur Rimbaud (1854-1891) 的名言。

脫離，將要瓜熟蒂落地成為「日裔臺灣人」之時，他們仍然必須面對被覆蓋，被壓抑在自身意識底下那另一層——或者說，那一層層——更久遠，更複雜，而且持續發出尖銳的，永遠無法抹除的多語雜音的，**其他種臺灣人**的歷史意識。

換言之，本文所討論的兩個關於臺灣的文學史論述，共同印證了臺灣社會史和政治史的主導動機：先來後到式的，不均衡的，重層的移民土著化，以及此種移民土著化過程中不同移民群體之間的支配與抵抗關係。這兩個臺灣歷史的主導動機並未在 1945 年日本移民因敗戰被強制遣返之後而消失——另一波新的外來移民在 1949 前後湧入臺灣，再次啟動另一波士著化，另一次的支配與抵抗，並且也將在日後再度誘發出兩種形同實異，相互對立的臺灣歷史意識與文學史想像。

「臺灣」是否可能成為文學史書寫的主體？作為一個歷史書寫主體，「臺灣」的主體性到底體現在什麼場域之中？是國家，還是社會？如果在國家，那麼如何克服臺灣政治史的斷裂與不連續？如果在社會，那麼如何處理臺灣社會史中的異質與分裂？1940 年代前半島田謹二和黃得時的文學史論爭向後來者提出了這些問題。這些問題至今依舊引人深思，甚至令人苦惱，因為他們都是關於主體形成的問題，然而臺灣的主體形成是一個仍在進行中的歷史運動，它的完成需要時間，但是它的結果卻是無法確定的。我們身處歷史之中，面向不確定的未來，因此感到煩惱而焦躁，因此忍不住想介入，想影響歷史的方向，於是即使已經親如家人，我們卻仍然持續齟齬，一如七十年前的島田謹二和黃得時。

儘管如此，我們如今已經不是純然無知了。詩人 T.S.Eliot 在〈四首四重奏〉當中寫道：

*“Only through time time is conquered.”*

（「唯有經過時間時間始被征服。」）

我們無法征服尚未經過的時間，然而經過七十年之後，我們確實獲得了一點時間所積累出的經驗的高度，站在這個高度上，我們儘管尚未能夠充分回答前人提出的所有問題，但卻已經比較可以看清楚我們所面對的課題。如今我們知道，任何預設以「臺灣」為主體之文學史書寫——事實上，應該說任何預設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書寫——都無法迴避這兩個課題：如何在敘事中處理多重歷史意識所

蘊含的多重時間性 (multiple temporalities)，以及如何透過合理的詮釋來安頓——不是解消——不同歷史意識之間的矛盾與對立。

「問題不在於寫由加利的俳句，而在於寫由加利和俳句！」——或許我們可以想像「文學士黃得時」如是回覆他敬愛的臺北帝國大學師友島田謹二罷。

## 引用書目

- イポリト・テーヌ（著）、平岡昇（譯）  
1943 《英國文學史》。東京：創元社。
- 大室幹雄  
2003 《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精読》。東京：岩波書店。
- 丸山真男  
1997(1964)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来社。
- 安田敏朗  
1997 《帝國日本の言語編制》。横濱：世織書房。
- 吳叡人  
2006 〈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2): 127-218。
- 巫永福  
1934 〈我々の創作問題〉，《臺灣文藝》1(1): 54-57。
- 長志珠絵  
1998 《近代日本と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
- 後藤新平  
2003 〈日本膨脹論〉，收於小路田泰直監修，《史料集 公と私の構造：日本における公共を考えるために》，第四卷：後藤新平と帝国と自治。東京：ゆまに書。
- 島田謹二  
1995 《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
- 鹿野政直  
2000(1999) 《近代日本思想案内》。東京：岩波書店。
- 黃得時  
2001 〈輓近の臺灣文學運動史〉，收於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芸評論集》，第四卷，頁 206-219。東京：綠蔭書房。  
2001 〈臺灣文學史序説〉，收於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芸評論集》，第五卷，頁 86-95。東京：綠蔭書房。  
2001 〈臺灣文學史（二）（三）〉，收於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芸評論集》，第五卷，頁 167-198。東京：綠蔭書房。
- 黃得時（著）、葉石濤（譯）、涂翠花（校譯）  
2006 〈臺灣文學史序説〉，收於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 229-241。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 鳳氣至純平  
2005 〈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份及其文化活動〉。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橋本恭子

- 2003 〈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齋藤一

- 2006 《帝国日本の英文学》。京都：人文書院。

Anderson, Benedict

- 2006(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Bhabha, Homi K. (ed.)

- 1990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Liauzu, Claude

- 2007 *Dictionna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aris: Larousse.

Finneran, Richard J. (ed.)

- 1996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Revised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Scribner Paperback Poetry.

Gosnell, Jonathan K.

- 2002 *The Politics of Frenchness in Colonial Algeria, 1930-1954*. Rochester, NY USA and Suffolk, U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Kiberd, Declan

- 1995 *Inventing Irel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N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che, Alphonse Victor

- 1954 *Provençal Regionalism: A study of the Movement of Revue Félibréenne, Le Feu, and other Reviews of Southern France*.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Thongchai Winichakul

- 1994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a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es of Multilayered Indigenization: A Prelimin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Discourses of Huang Te-shih and Shimada Kinji**

Rwei-ren Wu

### **ABSTRACT**

The argument of this paper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Shimada Kinji's discourse of literary history adopted the European theory of overseas or colonial literature as its framework. The so-called "overseas literature" is a complicated theory with duality. On the one hand, it regards overseas literature as extens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metropole from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expansionist nationalism. On the other hand, it maintains that overseas literature should create work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is aesthetical position entails differences, distortions, oppositions, and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secession. Starting from such theoretical position, Shimada went on to construct a subject of literary history that manifested a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While he argued that literature in Taiwan could not be anything but the extension of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metropole and thus Taiwan could not become a subject of literary history by itself, he admitted and even maintained that with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a Japanese language expanded overseas the subject formation of colonial Taiwan was possible.

Secondly, based upon the linguistic criterion of Japanese-centrism, Shimada's concep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dealt only with those Japanese writers traveling or immigrating to Taiwan who had a good command of Japanese as a literary language. The level of written Japanese of the Taiwanese writers was still so primitive that they were excluded from his treatise for the time being. Thirdly, Shimada followed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in constructing his narrative structure, but two related logics were hidden in this time sequence. On the one hand, Shimada evaluated the artistic maturity of each author's works of various stages according to criteria of realist aesthetics.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the process of gradual maturation of the realist aesthetics among the

authors under discussion tacitly corresponded to that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Japanese settlers in Taiwan. Fourthly, the emergence of a colonial subject in Shimada's literary history was a corollary of his aesthetic argument of realism. In other words, the emergence of colonial subject was an unintended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his unpolitical writing.

Huang Te-shih borrow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rench historian Hippolyte Taine's masterpiec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to construct his own literary history and thus was a typical discourse of history of national literature. First of all, Huang presumed that "Taiwan" constituted a subject of literary history parallel to "England" and "Japan." Secondly, he creatively extended the concept of race in Taine's methodology and interpreted the Taiwanese nation formation as the outcome of two processes of social history, i.e., indigenization and amalgamation of races. By way of this interpretive strategy, he on the one hand overcame the discontinuity of Taiwan's political history and made it possible for Taiwan to become a subject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constructed a pluralistic concept of "Taiwanese," thereby preserving a theoretical space for discussing multi-racial and multi-linguistic works. Thirdly, in term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Huang followed a time sequence of indigenization characteristic of a teleological order of "from settlers to natives." He discussed period by period how the creative works of Chinese settlers or writers about Taiwan were transformed from the writings of exiles, bureaucrats and travelers to native writings. Fourthly, Huang's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as a distinctly political writing in that he intentionally appropriated the discourse of local culture of Japan's *Taisei Yokusan* Movement of early 1940s to represent the thesis of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that emerged out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of the 1930s.

**Keywords:** Huang Te-shih, Shimada Kinji, Literary History, Settlers, Indigenizatio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Colonial Literature, Overseas Literature, Nationalism

